



王克和：英勇事迹激励后人

王克和(1906-1947),又名王景文,1906年生,永宁县望洪乡西河村人。1933年,马鸿逵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后,加紧了对宁夏人民的残酷统治,抓兵要粮,保甲连坐,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敲诈勒索,无恶不作,永宁县人民也不例外,同样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王克和深感这种生活的痛苦,他愤然离乡,赶着两头毛驴,驮上杂货,冲破马家军的关卡,走盐池,跑定边,又到内蒙古三段地,走乡串户做生意。

1935年,他把家迁到三段地,仍以经商谋生。由于他买卖公平,体恤穷人,经常给蒙、汉、回群众送钱送物或赔账经营,全凭群众自觉偿还,从不上门讨债,得到了当地人民的赞扬。

1936年5月,红军西征,在彭德怀司令员指挥下,解放了陕甘宁三省交界的地区。王克和到盐池、定边等地,亲眼目睹了红军的所作所为,他们军纪严明,秋毫无犯,群众十分拥护,当他听到了红军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心领神会,顿时受到启发与教育,由此萌发了参加革命的思想。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天津沦陷,敌人又向包头进攻,宁夏形势非常危险。针对当时形势,中央决定成立中共绥蒙工委和中共宁夏工委。绥蒙工委派田万生到三段地开辟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救国工作。通过接触,田万生觉得王克和思想进步,于是积极培养教育,使王克和阶级觉悟提高很快,随后,让他仍以经商为名,往返于鄂托克旗、永宁、宁朔、灵武等地,搜集敌方党、

政、军方面的情报,他干得很不错。

1944年1月,三边地委统战部派王延到三段地做宁夏方面的工作。田万生如实反映了情况,认为王克和已符合一名共产党员的条件,经过王延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王克和入党后,仍然做情报工作,同时,还做从宁夏逃到内蒙古的难民与逃兵工作。从永宁到三段地的逃兵,常常三五成群,在他家吃住,他借此进行宣传革命和抗日救国的道理,虽然道理浅显,但同志们领会得很深,所以,不少逃兵参加了抗日游击队。除此,王克和还根据三边地委指示,积极开展建党工作。在永宁,他先后发展了周光耀等4名同志入党,为永宁县的革命奠定了基础。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为了防备蒋介石下山摘桃子而发动内战,绥蒙工委指示三段地工作据点认真做好国民党地方保安部队工作。因王克和有做工作的经验,又加做生意的方便,所以,他受命与鄂托克旗中上层人物以拜“把兄弟”保持一定的关系。通过这一途径,同鄂托克旗的保安团长及其下属军官、士兵交朋友,开展工作。根据王延同志的指示,他终于同保安团长顾寿山及有些营、连排长拜了“把兄弟”,这为稳定鄂旗西南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

蒋介石是中国有名的政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言不由衷是全国人民皆知的。1946年,他终于发动了内战,重兵包围陕甘宁边区。马鸿逵秉承也大肆进攻三边,并同伊克昭盟保安司令奇恩诚阴谋窜犯盐池,威胁解放区的安全。

1947年1月,根据党中央指示,三边军分区决定打击奇恩诚的这股反动武装,要想取得成功,首先要掌握内情。三段地负责人派王克和侦察奇恩诚部活动规律,提供准确情报,以便一举歼灭。王克和接受任务后,缜密考虑,周详运作,昼夜工作。一天,他终于获悉了奇恩诚将于正月十五给下属的军官下请柬,准备于17日为其母过寿的重要情况后,立即报告工委。工委进一步查明,奇恩诚为母做寿是虚,集中200余名官兵密谋进犯三边才是真。三边军分区根据这一情报,紧急部署,由警八团、骑兵团和蒙汉支队共同参战,于17日,兵分三路,由王克和为向导,我军几路包剿,一举消灭了奇恩诚部,击毙、伤敌150余人,俘40余人。抓获马鸿逵驻奇部特务参议2名,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马匹、骆驼和木车。这次战斗的胜利,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为鄂旗除了一害,扫除了解放区盐池北部的威胁。

在这次战斗中,由于隐蔽不好,王克和被奇恩诚的家人认出,由此暴露了身份。为了避免敌人的报复,王克和回到永宁,更名为王景文,继续活动于永宁、灵武一带。

5月,奇恩诚的四叔杨生扎布带领清乡团到处搜捕王克和。这时,王克和在灵武一饭馆吃饭时,被奇家派出的便衣认出。奇家遂报告马鸿逵,王克和遭到了逮捕。

王克和被捕后,敌人用尽了所有手段,逼他供出共产党的组织。但无论怎样,他宁死不屈,只字不吐。3个多月过去了,永宁县警察局没有得到任何口供,无计可施,8月,

他被押送到了银川,交宁夏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审讯。

在军法处,王克和受尽了“插竹签”“揭背花”“坐老虎凳”等酷刑,但他毫不屈服。当他见到了在三段地工委撤退时被捕的王延,他向王延说:“我只向他们承认自己是被迫带路的,没有提到党,请党组织放心!干革命,哪有怕死的!死就死我一个,我绝不会连累党。”

敌人虽然得不到什么口供,又无证据,但奇恩诚的母亲在银川赖着不走,天天要马鸿逵下令处决王克和为其子抵命。马鸿逵当时在永宁望洪堡有一公馆,为了自己的安全,他认为有一王克和这样一个人很危险,于是决定就地枪毙,以便杀一儆百,同时,又满足了奇恩诚母亲的要求。

9月2日,军法处把王克和押回永宁县警察局与周光耀同住一牢房。夜深人静时,他对周光耀说:“即使把你送到军法处打死你,也不要说出组织。”周光耀,含着泪点头说:“是!我一定向你学习。”次日晨,王克和隔着铁窗向来收尸的妻子说:“挺着吧,好好照管孩子,不久就会解放,那时大家都有好日子过!”

凶神恶煞的刽子手打开牢门,架起王克和就要往外走,王克和大声吼道:“放开,我自己有两条腿,自己会走的!”他昂首挺胸,以沉稳的脚步走向永宁县城南桥子刑场,刽子手连放3枪王克和才倒下。在场的群众无不受鼓舞,他们流着泪赞扬王克和视死如归,是个刚强的硬汉子。王克和的名字永远传颂,王克和的英勇事迹永远激励着后人。

(据《宁夏革命英烈》)

林伯渠开荒种地

从1937年到1948年,林伯渠一直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他十分注意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用了极大的精力去抓生产。

1942年底和1943年初,陕甘宁边区军民在中共中央的号召下,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林伯渠不仅领导边区生产,更以实际行动成为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带头人之一。虽然工作繁忙,他还是挤出时间,在延安南川开了一片荒地,每天

工作后,他总是扛着农具前往他开垦的土地,在那里种上谷物和蔬菜,并持续锄草、施肥、浇水,做到精细管理。有个农民见林伯渠经常在大清早提着箩筐拣粪,非常感动,就领着儿子挑了两担粪倒在林老的粪堆上。林伯渠见到后表示感谢,但拒绝了农民父子的好意。1944年,林伯渠还亲自拟定了个人生产节约计划,主要内容是:一、从农业生产上,完成细粮二石交粮食局(用变工合作

方法);二、收集废纸交建设厅;三、自1944年1月25日起成绝吸外来纸烟;四、今年的棉衣、单衣、衬衣、鞋袜、被褥、手巾、肥皂、衬衣等公家供给。林伯渠还特意写了一首自题生产节约的诗:

待客开水不装烟,领得衣被用三年。
淡巴苏一亩公粮交,糖萝卜二分私费贍。
施肥锄草自动手,整旧如新不花钱。

发动男耕和女织,广辟菜羹良田。边区子弟多精壮,变工扎工唐将班。由于林伯渠精耕细作,管理有方,他那块地里的作物长势喜人,连年获得好收成。1944年,林伯渠去西安、重庆开展工作,前后半年多时间,影响了生产任务的完成。回到延安后的第二天,他就开始道歉,这件事使他身边的同志深受教育,至今还广为传颂。

(据《人民政协报》)

陕甘宁边区的第一位女县长

安塞,地处西北内陆黄土高原腹地,在延安的正北面。延安时期,有20多个中央直属机关设在安塞,当时是党中央重要的后方基地。1941年,一个消息传到安塞,犹如一颗重磅炸弹一下子炸开了。

安塞来了个女县长

“安塞来了个女县长”“安塞要成‘女儿国’了”。听到这个消息,安塞的老百姓有些想不通:“别的县长都是男子汉,为什么咱县上要派一个女县长?”虽然党中央落脚陕北后,很快就在人民群众中开展了反对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平等的宣传教育,但对接受新思想不久的老百姓来说,让一个女同志当县长,能不能干得好,还不是很放心。加上同时又来了三位女同志,是否要把一些男同志换下来,有些干部的情绪也开始不稳定起来。

这位女同志是谁?她为什么能到安塞县当县长?她能不能当好这个“父母官”?

这位女同志就是邵清华,江苏武进人,出生于1918年12月。1935年4月,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书时她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天津、西安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7年10月,按组织的决定,邵清华来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不久被派往绥德地区组织开展妇女工作。她做妇女工作时很有魄力,先后担任三边分区妇联副主任、绥德分区妇联主任。1940年12月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妇联执行委员。

1941年,陕甘宁边区根据“三三制”原则,进行第二届各级议会选举。边区政府十分注重对妇女群众的发动,号召广大妇女参选参政。延安

女子大学的学生参加了边区政府举办的选举训练班,并派出选举工作团到绥德、清涧、子长、吴堡等县开办训练班,普及选举知识,扩大宣传,训练选举干部。在选举中,由于妇女群众大多不识字,就采用“投豆”“烧洞洞”的方法,同意谁就在谁背后的碗里放一颗豆子,或请识字的人念选票,用点燃的香在候选人的名字下烧个洞,表示同意。在这次选举中,选出乡级女参议员2005人,县级167人,边区一级17人,一些妇女荣任乡长、区长。年仅24岁的邵清华当选为安塞县县长,成为陕甘宁边区第一位女县长。

深入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1941年7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与边区妇联专门召开座谈会,欢送女县长赴任。延安女科大学还从高级班选调章岩、路岩、李蕴辉三位女干部协助邵清华工作。中央妇委的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都热情支持她,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鼓励她以实际行动努力工作,更广泛地联系群众,深入实际,多做调查研究。

初到安塞,邵清华就深入基层一线,从最远的七区开始调研。这里有一百多里远,且道路崎岖,只能徒步翻山越岭。在面对面和群众交谈中,她了解到军属的困难,发现有有的人好吃懒做不好好劳动,跳大神的“神汉”装神弄鬼骗人,有些干部工作作风不好……她及时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和区、乡、村干部研究解决办法。第二次下乡,她来到全县第二偏僻的五区,了解到基层在征收粮食时,只是自上而下分配任务,但对群众手里有多少粮食心中无底,提出的定额超出群众承受能力,在粮食歉收年时,矛盾

就特别突出。负责征粮任务的有些干部方法简单,态度不好,引起了群众的反感。根据这些情况,邵清华及时召开干部会议研究讨论,要求各级干部讲究政策,注意工作方法,特别是歉收的地方要如实报告灾情,及时减少这些地方的征粮任务,对确有困难的农户,不仅不征公粮,还发粮救济。如此一来,群众的困难解决了,他们很受感动,更加踊跃交纳公粮,提前完成了征粮任务。

为了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邵清华下到每个区宣传动员,帮助建立春耕委员会。她到徐家沟抓试点,组织变工队互帮互助,生产搞得热火朝天,就连一贯游手好闲的人也被带动参加了生产。徐家沟的经验很快在全县推广开来。安塞原来不产棉花,也很少有人会纺线织布。邵清华就请来外地一位会纺织的妇女来教大家。先动员17名妇女学习,在掌握了技术后,又派她们到各区去当老师,用滚雪球

“深受该县民众之欢迎”

邵清华工作有思路有方法,又公正公平,吃苦耐劳、平易近人,很快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就连那些刚开始不服气的男同志也逐渐认了她。

安塞县绝大部分人没有长途运输的习惯,只有个别跑运输的脚户。为了完成好上级赋予的运盐任务,邵清华就以有经验的人为骨干,以有骡、马等牲口的人家为主,组织运输大队和分队,并耐心向群众解释运盐工作的意义、政策和方法。第一次任务完成后,她组织大家及时作小结。群众看到,参与运盐的户户还有一些收入、运输费用也能得到补偿,表现好的还受到

了表扬和奖励,纷纷表示也愿意参加运盐工作。之后的运盐工作就比较顺利了。

安塞六区曾因歉收,发生过一起哄抢粮库事件。邵清华上任后,注意倾听群众反映。经过调查,查实原化子坪乡指导员张彦等个别干部平时就勾结起来盗窃粮库粮食。在群众吃粮困难时,既不向上级反映,也不想办法为群众借粮,反而挑唆群众抢粮,企图乘乱掩盖他们非法盗窃粮食的罪行。邵清华下令逮捕了张彦,从重处理了贪污盗窃国库公粮的坏分子,并在全县开展廉洁守法教育,着重教育干部和党员廉洁奉公,带头遵纪守法。

安塞原本文化落后,女孩子没有受教育的机会。邵清华到任后,在县政府附近办起了一所女子小学,请女校长、女教师来任教。开始只有几十名学生,后来发展到一百多名。学生不分年龄,按文化编班。教师、校长与学生家长密切联系,从各方面照顾学生,帮助家长解决困难。如路远的学生,老师就经常送她们回家。学生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后,可以写简单的信,记简单的账,个别还可以给人读报。

邵清华作为陕甘宁边区的第一位女县长,她爱民为民的事迹很快传开了。延安《解放日报》在专门报道中写道:“该县政府在她的主持下,一切均井井有条,成绩斐然,深受该县民众之欢迎。”《新华日报》也称赞她到任不久就“声威大震,在老百姓心目中成了真正的民之父母官了”。

1943年,邵清华调离安塞,进入中央党校学习。之后,在河北、天津的妇联等部门担任领导职务,1993年退休,2013年2月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95岁。

(据《学习时报》)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对陕甘宁边区实行断供、断邮的财政封锁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困难。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民众一手抓自力更生,一手抓精兵简政,政府带头过紧日子,争做领导大家胜利渡过难关的模范。

粉碎日寇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1941年8月22日,毛主席在给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的信中指出:“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既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后来他又在讲话中强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为了保证边区经济以粉碎日寇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政府1941年发行“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救国公债”,原计划发行额500万元,由于边区人民对政府热烈拥护,踊跃认购,实际完成数为618万元,此项债款当年发放经济建设投资500万元,其余118万元作经费开支。在农业方面,主要用于修水利、设模范农场、购棉种、开林场、低利贷款给移民和贫农,改良农具种子,改良畜种、训练兽医人员等;在工业方面,主要用于办制造日用品的各种工厂,贷款给私人开矿的、办工业的以及生产合作等,使得各种用品逐渐不用向边区外买;在商业方面,主要用于发展消费合作社,帮助公私经营的商店。此项公债1942年、1943年还本付息两次,两年中还本付息总数130余万元,到1944年连同本年度应付利息500万元,一次性全部偿清。

“极大力量注意人民经济的建设”

针对“救国公粮”多、“救民私粮”少产生的民力负担重的矛盾,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讲话中指出:“如果我们的党与政府不发动动员人民并帮助人民发展工商业,则人民生活既不能改善,抗战需要亦不能供给,其结果就是军民交困。军心民心如不能巩固,一切也就无从说起,所以党与政府应用极大力量注意人民经济的建设,乃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任务。”

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税收有四种:货物税(出入口税);营业税(商业税);牲畜斗佣税(牲畜粮食手续费);盐税。前三种在税局征收,后一种是盐的出产税,盐在全边区流通只征收一次,由盐业局征收。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税收有几个典型特点:一是以货物税(即关税)占据最主要的地位。1941年货物税占全年税收总额的74%,1942年占84%,商业税1941年不过占全年税收总额的19%,1942年不过13%,充分说明边区税收的主要来源,是间接税,而非直接征收商人的所得税。二是工业无税,不论是私营的、公营的与公私合营的。三是政府奖励的事业免税,如植棉、纺织、纸张与工业原料完全免税。四是商业多分等级收税。为了使商业税更加公平合理,由单纯摊派走向以纯收益为累进征收标准。如延安市的商户,分为10等30级。在征收过程中,经常照顾到小商贩的利益,或者免税,或者征以轻税。这些事实充分说明边区的税收政策是顾及人民负担能力与各阶层的利益原则。

厉行勤俭节约

早在1937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前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就作出决定:政府办公费实行最节俭的原则。县政府办公费每月规定30元,即便是在行政专员驻在地,其办公费得酌量增加的情况下,每月最多也不得超过50元。至于区一级政府办公费每月规定为3元至4元,乡政府经费,则每月由边区政府津贴6元,办公费包括在内,且乡长不另支伙食、鞋袜费。边区政府主席每月津贴5元,乡长每月津贴1.5元。乡政府每月的办公费只有1元,整个乡政府,只有乡长一人脱离生产,并无薪金,除津贴一元五角外,每天公粮一斤四两,菜钱四分。除乡长外,其他委员、村民委员会主任,都是没有任何薪俸和津贴。

1943年《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规定:一、不急之务不举,不急之钱不用,且须在急需和急用上,力求合理经济;二、除保证给养外,其他经费,概须厉行节省。提倡勤俭朴素,避免铺张浪费;疏散机关,调整窑洞,停止建筑;减少公差公车,提倡动手动脑;实行粮票制,免去双重粮的浪费;注意一张纸、一片布、一点灯油、一根火柴的节省;爱惜每件公物,使之多用些日子;不追加预算,并建立严格的审计制度;三、集中力量于急要的经济事业,实行经济核算制;并加强其管理和监督,开展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四、爱惜民力,节制动员,不浪费一个民力、一匹民畜;五、坚持廉洁节约作风,严厉反对贪污腐化现象。

边区财政厅从财政预算节约入手积极落实纲要内容:一是6万余人的布匹全部自织,不买一匹布,全体穿土布,可节省1000万元。二是确定印刷出版、兵工器材、通信材料等计划及政务军务费用预算,以求节省。三是边区本身子弟的中学学生衣服、伙食自备,政府供给笔墨课本。四是个人节约与公共节约并重。在个人节约方面,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订出个人节约办法,在公共节约方面,特别注意粮食、被服、建筑、用具等方面的节约。

1944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提出,政府办公经费只发一半,试行三个月,结果大部分机关可以节省,减少了浪费,只有少数机关吃了“母鸡”(老本)。据统计,1945年全边区共节约20亿元,足够公家一年的生活费。用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话来说,就是“边区的财政是‘取之有道,用之得当’的。在数量上讲,全世界没有这样穷这样廉的政府,在内容上讲,全世界又没有这样有理由有节的财政”。

建设节约型政府

1942年,毛主席强调:“各抗日根据地的全体同志必须认识,今后的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目前,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因而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会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朱德总司令在整财会议上指出:“现在人多了,家就不好当,因为没钱。平均主义使我们很多事情行不通。现在转变这思想,所以要搞清制度,要分清人的职分,大家不做事情,只要做官,要学习,要吃穿,是不行的。”

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的精兵简政运动先后进行过三次。第一次精兵简政活动自1941年12月开始到1942年4月结束,主要工作成绩是裁减了一些骈枝机构,缩减了数千名的工作人员,其中“边区一级缩减至82%,专署,县区,乡级缩减至70%”。不足之处是“缺乏经验,对精简工作必要性认识不足,思想提高不多,工作改进不大”。第二次精简活动自1942年6月开始到1942年8月结束,这次精简的重点是建立了“合署办公、政务与事务分工、加强下级、提高县政府职权”的一些工作制度,精简的结果是“建立和健全了制度,上级机关也精简了一些人员,但又都充实了基层组织,实际精简不多”。第三次精简活动自1943年1月开始到1944年1月结束,这次精简活动遵循毛泽东提出的“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方针,认真执行了“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准备文件、听取指示、贯彻执行”几个环节,同前两次精兵简政活动只在政府系统中进行不同,第三次精兵简政是在政府系统、党中央系统、西北局系统和军队系统中全面进行。经过1年的努力,基本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个方面的目标。

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面对敌人的军事摩擦和财政封锁,在大的施政方针上认真地实行精兵简政、厉行节约和一切其他节省民力、充裕民力的措施,同时从穿衣吃饭这些日常问题上,用现实的行动、具体的事实告诉人民,党和政府是跟他们血肉相连、甘苦与共的,党和政府不仅在敌人面前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保护者,而且在困难面前也是咬牙吃苦有计划有办法领导大家胜利渡过难关的模范。中国共产党以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告诉大家:“目前所遭遇的困难乃是胜利之前的困难,漫漫长夜已将破晓,目前的黑暗一过,天就要明了。”(据《学习时报》)

陕甘宁边区政府如何过紧日子